

章士钊与近代名人

丁仕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章士钊与近代名人/丁仕原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

ISBN 7 - 5034 - 1719 - 6

I . 章… II . 丁… III . 章士钊 (1881 ~ 1973) — 生平事迹 IV .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9001 号

责任编辑：梁志安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北京华正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 375 字数：227 千字

印 数：5000 册 插页：1

版 次：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 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章士钊先生

序

白吉庵

去年秋天，仕原先生因公路过京城，同我谈到他想将自己研究章士钊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希望我能为之作序。仕原先生是章先生同乡，是章学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与我相交甚久。我们曾在北京、长沙多次见面。他曾虚心向我请教章先生的问题，交流研究心得。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对仕原先生的这个请求，我都乐意为之。

行严先生是 20 世纪重要人物之一。早年参加爱国学社，是《苏报》案的主角。曾主编《甲寅》杂志，担任过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与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有交往，对社会、对历史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多才多艺，办过报、从过政、当过律师、教授，也创作有大量诗词与小说。当然，章先生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他从 1903 年在南京罢课到上海从事革命，到 1973 年到香港为国共和谈鞠躬尽瘁，经历了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民国与新中国五个朝代，在 20 世纪舞台上整整活跃了 70 年。他交友遍天下，孙中山先生曾说：“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章先生特立独行，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研究章先生与近代名人的交往，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它通过一个人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公正、客观地认识章士钊及其所处的时代，这对 21 世纪的人们，对中华民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章学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不少人以此为硕士、博士论文的课题进行著述。仕原先生独辟蹊径，以人为本，从章先生与近代名人交往展开研究，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全书20万字，从章先生与同盟会、北洋军阀、共产党及文化界的名流交往，展示章先生的胸怀与做人风范，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美好品德。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曾到长沙、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并采访过章先生的亲友。《人物》、《书屋》、《百年潮》等知名刊物上都曾发表过仕原先生的大作。

仕原先生是学中文的，又多年研究湖湘文化，有较深的史学底蕴。因而全书写得文笔流畅、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有着丰富的史学意义与学术价值，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在主编《章士钊全集》时，就同他有书信往来。他搜集到的章先生在重庆所写的诗集《游沪草》因故未能编入全集中，只是在后记里留下了大名。他访问章先生侄女章伟如女士的文章，填补了章先生在重庆生活的空白，受到学术界好评。他写作的章先生与陈独秀晚年的友谊、与毛泽东的特殊情谊，以及同高二适的诗文唱和发表后被多家网站转载，受到读者欢迎。我相信，《章士钊与近代名人》一书出版后，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首肯，得到广泛的读者。

2005年5月1日
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录

序 白吉庵 (1)

与辛亥名人的友情

章士钊是亲历五个朝代的风云人物，他与孙中山、黄兴有着深厚的友谊。孙中山曾说：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他与章太炎是结义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史上皆建有不朽的功绩。他与有“先生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美誉的于右任关系非同一般，即使解放后海峡相隔，也未阻断二人的诗文唱和。清末志士吴樾，异姓兄弟邹容、辛亥同乡蒋翊武，以及许多辛亥先烈都使他难以忘怀。

章士钊与黄兴 (2)

走向共和，同组华兴会

“二次革命”，流亡东京

可贵的“无我”精神

章士钊与章太炎 (15)

结义“爱国”，《苏报》震动世界

联省自治，结果事与愿违

坚持文言，一意保存国粹

章士钊与于右任 (26)

记挂于右任老伴寿辰

早年报人生涯

避难重庆，以诗自娱
隔不断的友谊

章士钊对蒋翊武等先烈的怀念 (37)
漓江试数英雄泪
追忆往事，怀念胞弟
晚年著文，纪念先烈

同北洋权贵的往来

在近代名人中，章士钊在军事上最崇拜的是袁世凯和岑春煊。但他择友却只与岑春煊结下终生之谊。他曾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出山谋划“临时执政”的策略，解决了段执政的重重困难，也因与段合作，荣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落得身败名裂。他与梁启超 20 余年间的分分合合，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政治途中在学术与政治间徘徊的共同遭际。他与张作霖及少帅张学良的交往也令人称道。

章士钊与袁世凯、岑春煊 (49)

不为所用，奋起反抗
语无不合，甘作幕僚

章士钊与段祺瑞 (58)

“临时执政”，段祺瑞三造共和辉煌后的余光
出谋划策，章士钊一身兼两总长，期冀干一番事业
怀国士之报，西山觅地葬故人

章士钊与梁启超 (67)

辛亥革命前的斗争
“二次革命”时的不同政见

最终的友谊与分歧

章士钊与张作霖父子 (87)

营救故友，奔走大元帅府

应少帅之邀，到东北大学任教

开办律师事务所，为张家与美国建筑商打官司

和共产党的领袖们

章士钊与共产党有缘，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
20世纪初就在他主编的杂志共事。他与陈独秀一生相交，
既是同志、战友，又是论敌、对手。李大钊与他尽管个性不同、政见不一，但二人却能相互影响、友情深厚。
与毛泽东的友谊能够持续半个多世纪，可以说说明许多问题。
集毁誉于一身的章士钊同朱德、周恩来、陶铸的交往，也不能不使他面对共产党的礼遇扪心自问：
“读书堂下，试问谁是人杰？”

章士钊与毛泽东 (101)

相识与赠款

“好管闲事”

毛泽东亲自“正名”

“两指要”的出版

章士钊与陈独秀 (111)

共倡大义

分道扬镳

义务律师

晚年友情

章士钊与李大钊 (128)

聚首东京，讨论“爱国心”
主办《甲寅》，纠正政治偏向
孤松、孤桐，情深意重

章士钊与周恩来、陶铸 (135)
“文革”中尽情保护
共同关照友人后代
“宾妾主绝怜，戒人勿我惊”

同文化界名流的往来

章士钊本质上是个文人，他与新旧文化名流几乎都有往来。他与胡适是朋友，又是论敌，以他二人为代表的文（言）白（话文）之争，影响深远。他与鲁迅之间的行政诉讼，轰动一时，已成历史公案。近代著名学者、诗人沈尹默与他从断绝关系到尽释前嫌，通俗小说家张恨水多年与他结下的不解之缘，以及学界名流高二适与他的诗文唱和，都在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

章士钊与胡适 (148)
“总算老章投了降”
“老章又反叛了”
孰是孰非，自有公道

章士钊与鲁迅 (159)
女师大风潮
鲁迅控告章士钊
诉讼的意义

章士钊与沈尹默 (175)
北大同事，新旧相左

避难陪都，长打短打

章士钊与张恨水 (183)

被写入《春明外史》

《啼笑因缘》的律师

欢聚在中央文史馆

章士钊与高二适 (193)

陪都重庆的诗文唱和

解放后的互致问候

兰亭公案之争

吾爱我师，更爱真理

与其他名流的交往

章士钊一生交友遍天下，不仅与各个政党名人、学界名流关系密切，就是三教九流也无所不交。他同上海闻人杜月笙“一日不得见，问讯不辞烦”，保持着深厚的友情。他与大汉奸周佛海也有联系，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律师身份为其辩护。他与社会党的张君劢也有相当深的交往。因其曾到日本、英国、德国等留学考察，同海外名流萧伯纳、弗洛伊德等人也往来甚多。

章士钊与周佛海 (202)

抗战末期，初试牛刀

无罪辩护，牵强附会

章士钊与杜月笙 (212)

诗文酬唱，友情深厚

学者“教父”，时代使然

章士钊与张君劢 (221)

一纸飞从美西岸

多年朋友

义正辞严，难能可贵

章士钊与萧伯纳、弗洛伊德 (230)

三次欧洲之行

潘悌、萧伯纳与“农业治国”

弗洛伊德与近代中国心理学

附录一：我的三叔章士钊 章伟如 (244)

附录二：章士钊与近代名人交注的启迪 (254)

后记 (288)

与辛亥名人的友情

章士钊是亲历五个朝代的风云人物，他与孙中山、黄兴有着深厚的友谊。孙中山曾说：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他与章太炎是结义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史上皆建有不朽的功绩。他与有“先生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美誉的于右任关系非同一般，即使解放后海峡相隔，也未阻断二人的诗文唱和。清末志士吴樾，异姓兄弟邹容、辛亥同乡蒋翊武，以及许多辛亥先烈都使他难以忘怀。

章士钊与黄兴

章士钊与黄兴是同乡、同学、同志和战友。章士钊曾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① 在孙中山等广东人看来，章士钊则是典型的黄兴派。黄兴要是不过早辞世，章士钊的后半生可能是另一个模样。

走向共和，同组华兴会

章士钊和黄兴都是湖南长沙东乡人，不过黄比章大7岁。他们一度在武昌两湖书院同过学。至《苏报》案发生前，他们虽有往来，但仅限于一般的应酬。当《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开始正式投身革命。这才有“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江督魏光焘第三子，新由东京返国）；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②

龙砚仙（1854—1918），即龙璋，别号甓勤，晚号潜叟，湖南攸县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世家，其曾祖龙彬为秀

^{①、②}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8，第321、311、312页。

才；祖父龙友夔为恩贡生、国子监学正、候选教谕；父亲龙汝霖为举人，曾在山西曲沃、高平，江西安远、铅山等地任知县，后升任直隶州知州；二叔龙溥霖为举人，以候选同知，先后任广西候补知府、署桂林平乐等府知府、泗城府知府，因军功加补用道；三叔龙湛霖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是一代名宦。龙璋本人自幼即刻苦研读儒家典籍，才华横溢，22岁就乡试中举，名声大噪。中举后，曾先后七次入京参加会试，但都失意而归，在科举场中追逐功名近20年；1894年以中书改官知县，先后任江苏沐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地知县（记名候选道员），时间长达10余年，1907年因母丧丁忧辞官回籍。龙璋一直紧跟时代潮流，先后与杨毓麟、黄兴、蔡锷、宋教仁、周震鳞、焦达峰、陈作新等结交，大力支持革命活动，尝试利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1903年，黄兴、章士钊为筹集建立华兴会的经费，特赴泰兴拜访龙璋，“专以此事就商，结果如愿以偿”。^①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龙璋的寓所西园召开的，龙璋亲自与会。龙璋还动用自己所办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由上海秘密购送长枪500杆、手枪200枝存放在长沙市郊，以供华兴会长沙起义之用。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因藏匿于龙璋家中才得免被捕。同年，黄兴因万福华案在上海被捕，蔡锷赶到泰兴向龙璋求救，龙璋“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营救”。最后，又是龙璋向会审公廨把黄兴保释出狱。1911年春，黄兴派人到湖南为黄花岗起义筹款，龙璋当即赞助3万元。同年2月，焦达峰、陈作新、龙璋等百余人在龙璋住宅开会，商议响应广州起义的办法。章士钊亦曾指出“辛亥以前，由海东贯长江，略洞庭而南，上下数千里间，吾党所为处心积

^① 龙伯坚：《龙璋事略》，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2页。

虑，不论激随隐显，殆莫不有龙氏一门（包括龙璋、龙湛霖、龙绂瑞、龙毓峻等——引者注）之心计与血汗渐浸其中。”^① 其中龙璋的贡献最大。

华兴会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发动了多次起义，前赴后继，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华兴会则与黄兴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它成立于1903年的长沙，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共12人。其中10人是湖南人，黄兴、章士钊外，还有刘揆一、胡瑛等人。会后，章士钊返回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兴建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印刷邹容的《革命军》和他自己撰写的《孙逸仙》、《沈荩》等革命小册子，继续其革命宣传工作。黄兴则留在长沙，以明德中学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成立了华兴会机关，联络会党，随时准备起义。龙萸溪在其笔记中曾这样记载：

华兴公司，赁屋于南门外为之，表面标榜兴办实业，里面直是革命组织。无何，外间指目克强为革命党，谣言稍起。九月二十五日，余在家中宴客，克强与焉，扬扬如平时。唯笑谓余：“有相士谓我，将有缧绁之灾。”余曰：“此无稽谰言，公何言之？”时克强寓紫东园，忽报寓所有士兵搜检，里衙遮阻，人不得出入。寻知会党首领马福益部失风，于醴陵车站被逮，词连黄廑午老师，即克强也。余亟引克强入西园密室暂避，而外察形势。时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赜，皆素交，且通达时务，无意兴大狱，事稍缓。是夜，克

^①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强以布置革命实况见告，党众约2万余人，教员学生居多，惟无一语及新军。此或克强不欲激动渝寿丞，俾便相助，亦未可料。综计克强所语要点，归宿于十月十日那拉后万寿节，百官赴皇殿庆祝时，一举轰之，从而四方响应，庶几成事。今事已破坏，无取渎叙，现同志被获者不知几何人，如事态扩大，为首者谊当到官，何忍独生云云。胡子靖、谭祖安均在座，闻此言，则共劝慰毋躁，以图善后。克强又言：有一藏置秘件之小箱，存西长街长沙中学室内，不可放佚。余假托谒客，衣冠出门，迳往该中学携归，就中册籍名纸，悉数焚毁，不留痕迹。克强因取自用水晶小印章赠余，已则读书自遣，饮啖自如，如是者三日。寻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及湖北曹亚伯掩护出乡赴沪。久之，湘抚端方谓余：“足下胡乃放走黄兴？”张小浦从旁答曰：“龙黄溪不能卖友。”亦遂释然。^①

黄兴到上海与章士钊等人会合后，又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原有华兴会外，又在湖南增设同仇会，以联络红帮弟兄。在上海另建立爱国协会，以团结革命志士。因黄兴名声太大，他本人又坚决不肯任会长，于是由杨笃生为主、章士钊为副组成领导机构。蔡元培、陈独秀、蔡松坡等人均在杨笃生的监督下加入了爱国协会。他们计划是以暴动为主，并进行暗杀活动。由于杨笃生是学习化学的，便由他进行武器的研制与试验。不久，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失败被抓，章士钊前往狱中看望，连累爱国协会10多人入狱。黄兴与章士钊二人更是难逃劫难，先后被抓入牢中。

^①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人物志》（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页。

后由于各方面的帮忙，他们才得以先后出狱，并前往日本。对于这一段经历，章士钊后来曾以诗记其事。诗曰：

醴陵初失律，歃血同黄杨。
协会溢爱国，杨主而吾襄。①

正是这次在东京，黄兴得以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在原有兴中会、华兴会等组织的基础上组建起了同盟会，中国近代革命从此走上了崭新的道路。

但此时，章士钊回首自己数年的生活道路，认为革命必须有分工不同，自己未到壮年，应当发愤读书，对政法等问题有所研究，才会对革命有用。于是，他不顾章太炎等老朋友的劝说，坚决拒绝加入同盟会组织。人们对此很不理解，加上当时参与劝说的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后来成为了章的夫人，以致在近代史上留下了章行严与同盟会的关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逸闻。

后来还是章本人与黄兴谈了自己这一观点后，才得到人们的谅解。此后章士钊到欧洲潜心研究学术，并在国内刊物上经常发表有关政党、宪法以及政体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为宋教仁所重视，并拿来作为民国成立时建国的重要蓝本。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黄兴襄助一切。这一时期，“国内事务方面，黄兴似乎行使了比孙中山更大的权力。据胡汉民回忆：先生（孙中山）以余为总统府秘书长。各部部长之职，则采纳克强意见。”② 另一同盟会元老张继在回忆中也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

① 《近诗废疾·初出湘》，《章士钊全集》7，第202页。

② （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